

真实的童年还是梦幻的童年?

——论《呼兰河传》的真实性与文学性

朱幸纯

(厦门大学 中文系, 厦门 361005)

摘要:《呼兰河传》作为萧红的|部具有自传性质的文学作品,常常被人当作为她做传记的重要资料,同时诸多研究者也采用萧红的传记对她的这部作品进行研究,特别是关于她的童年的相关研究。但实际上传记与文学之间存在较大区别,不应将萧红的传记与她的文学作品完全等同起来。

关键词:萧红;《呼兰河传》;传记;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44X(2010)3-0016-03

作者简介:朱幸纯(1986-),女,湖北荆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

《呼兰河传》是萧红的代表作,是她在阅历了人生之后写的一本童年回忆录。作品的第三章和第四章都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比较详细地描述了“我”童年的生活。在其他章节中也多多少少涉及到“我”的童年和家世。茅盾也在《呼兰河传》序中写到:“《呼兰河传》给我们看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1]因此,《呼兰河传》一直被视为萧红童年的自传。有很多人根据萧红的传记来研究《呼兰河传》这部文学作品,或者根据《呼兰河传》来寻找萧红童年生活的痕迹。然而,《呼兰河传》究竟是自传性艺术作品还是萧红家世的传记?我们该如何看待该作品和作家童年生活的关系呢?

一、萧红作品与传记的相互影响

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描写的童年,透出浓郁的悲凉和寂寞的气息。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也肯定了萧红的童年是寂寞和孤独的。“用什么来对那个顽固而偏心的父亲报复呀?”^[2]“萧红这时候的憧憬自然,因为她在人间的生活上所见到的多是丑恶和痛苦。”^[3]从这些话语都可以见出萧红从父亲和家庭中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冷漠与丑恶。葛浩文在《萧红评传》第一章《呼兰河——<永久的憧憬与追求>》中,详细地介绍了萧红童年生活的地方呼兰县,她父亲的“为贪婪而失掉人性”,母亲的“恶言恶色”,祖父的慈祥善良以及后园的美好时光。“她是在缺乏爱,缺乏朋友的环境下长成,她日后所写回忆儿时生活的篇章中,可看出‘孤寂’对她的敏感个性有多么重大的影响。”^[4]在葛浩文的文章的注释中,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参考资料都来自于萧红的作品,特别是以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和散文《永远的憧憬和追求》最为关键,另外还有《家族以外的人》等,此外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也是该文章的重要的参考资料。

而到了肖凤的《悲情女作家萧红》这本关于萧红的文学传记,作者在第一章《呼兰河》中,大胆地将《呼兰河传》中的关于童年,关于祖父、祖母、父亲、母亲甚至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冯歪嘴子等诸多人物,以及呼兰河的风俗等进行了第三人称的转换,以此作为萧红童年和家乡的具有文学性的传记。而肖凤在《我为什么要写<萧红传>》中这样写到:“我写《萧红传》是企图运用抒情散文的体裁,表现这位女作家的短促而又不平常的一生。在旧中国,一位作家的前进道路上往往布满了荆棘,而一位女性作家的道路尤其曲折和坎坷。给一位作家写文学传记,主要是掌握她(或他)的思想、感情、创作发展的脉络,当然也不能完全忽略有关她的生平的资料。在写作《萧红传》的过程中,我遇到的困难是:虽然我已熟知了这位作家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剧本、评论文章等),但是在搜集有关她的生平资料时,对于一件事、一个人、一个日期,却常常遇到几种不同的说法。除去早已形成文字的各种回忆录之外,还有几位健在的老人,近几年来,又出现了几位热心搜集资料的研究者,这些宝贵的材料为我提供了大量的依据。而当我面对着说法完全不同的资料时,我采用的办法是:尽量以萧红本人的作品为依据;如果在作品中找不到依据时,就尽量尊重此时、此地、此事的当事人的意见;如果实在判断不了时,就采用每章后面加小注的做法,把几种材料的说法原原本本地开列给读者。”^[5]应该说,肖凤在写作《萧红传》时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但是,我们也仍然可以看出她在创作中对萧红作品形成了过分的依赖。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呼兰河》根本就是对《呼兰河传》中内容的一个

收稿日期: 2009-11-15

简要概述。这里,我们必须明白传记和传记文学不能等同。记载人物经历的作品称传记,而传记文学是以史实为题材,通过叙述、描写、证明或议论传主的生活经历、外貌特征、心理活动、言行气度等来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主题思想的文学作品。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以历史上或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描写对象,所写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必须符合史实,不允许虚构。在局部细节和次要人物上则可以运用想象或夸张,作一定的艺术加工,但这种加工也必须符合人物性格和生活的特定逻辑。在肖凤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她对萧红的作品的真实性过分信任,她在很大程度上把《呼兰河传》中描述的故事当作真实生活的忠实记录,因此,她在写作传记文学的时候选择了忽视文学和作者生活的界限,将作品中的情节大胆地运用到了文学传记的写作中。传记文学本质上还是文学,“传记”只是“文学”的限制语。肖凤的这部著作虽然作为“传记”来定义,但我们必须对这部著作的文学性和传记的真实性有一定的区分。所以,如果作为研究资料来参考,我们需要抱有比较慎重的态度。我们不能根据萧红作品中虚构的叙述,特别是小说中虚构的东西,做绝对性的推论,以此编写一个作家传记。作家的生活与作品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

以上所说的三部关于萧红的传记,被诸多的研究萧红及其文学作品的论文所引用,足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然而,在《呼兰河人说萧红》一书中,王化钰、李重华以《〈呼兰河传〉考论》为题,向研究者和读者发问:《呼兰河传》是自传性艺术作品还是萧红家世的传记?他们认为“有的人竟根据《呼兰河传》中的人物来论定作者的身世及其家庭的人际关系,从而推导出一些完全错误的结论。”^[6]在他们的这篇文章中,他们详细谈到了以下几点:其一,小说虽然名为《呼兰河传》但是绝对不是呼兰河的传记,用历史的眼光来考察,发现萧红当年知道发生在呼兰河的许多重大事件,她并没有写入这个小城的“传”中。其二,《呼兰河传》中描绘给人们的呼兰这座小城的自然风貌也是不符合呼兰县的实际情况的,呼兰县实际上在当时是一个经济发达,繁荣昌盛的县镇。并且指出了葛浩文的《萧红评传》中的“不实”的议论来自萧红的作品。而萧红之所以这样描写,是同她的创作思想密切相关,即向着人类的愚昧。其三,祖父并不是一位慈祥可爱的人,而是一个阶级等级观念明确,完全守旧似的人物。有时十分残忍,不讲道理。其四,萧红实际上是在充满母爱和父爱的温暖阳光下,健康成长起来的,也许正是家人的娇惯,才使她养成了那种过分任性的性格。其五,父亲也绝不是因贪婪而失掉人性的。他提倡科学和民主,具有维新思想,是个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对萧红后来的“除籍”等只是一种惩罚手段罢了。其六,有二伯在张家是相当有地位的。最后,得出了以下结论:

《呼兰河传》虽然提供给我们一些研究萧红及其家世的信息(注意:我们这里说的是信息!),但它毕竟是文艺作品,不是传记资料。所以,把它里面的人物,事件当作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并以此为依据而得出关于萧红及其家世的结论是欠妥的。它只能是“一篇叙事诗,一副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7]

可以说,《〈呼兰河传〉考论》的写作动机和结论都是恰当的,但是,在各种求证过程中,却明显地有很多漏洞,其一,因为《呼兰河传》没有完全为呼兰作传,就从一个前提下否定了后面各种事件和人物真实性的一面,这未免有点以偏概全。其二,萧红的祖父即使是一个等级观念很严重的人,甚至对下面的人“残酷”,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萧红的爱,更不妨碍童年的萧红对祖父的爱认识和感受,毕竟儿童的感受是单纯的。其三,萧红因被祖父溺爱,所以父母才对她严厉。但是这个前提已经和前面相冲突,既然王化钰、李重华认为萧红对祖父的描写不符合实际,那实际中祖父又怎么会和作品中一样对她溺爱呢?又怎么会导致父母的严厉呢?显然,在这篇文章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自相矛盾的说法。其四,父亲接受新式教育实际上也和他的道德和善良与否并没有必然联系,但王化钰、李重华却将二者作为因果关系来论述,从而得出了与大多数人截然不同的结论。最后,关于有二伯的结论,也是二人的一种推论。固然,二人对目前关于萧红研究中出现的问题的思考和诘问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他们在阐述自身理由的时候,很多却是依据主观推论,缺乏有力的说服力,而且也没有从文学这个根本的对象入手,所以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二、作为文学作品的《呼兰河传》

一部文学作品有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作者。因此,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传记为系统地研究作家的心理和作品的创作过程提供了材料。根据所阅读和掌握的资料,我们认为萧红对童年的感受基本上是符合《呼兰河传》中的情感基调的,她的成长和生活经历以及感受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助于我们分析和理解她的作品。

“萧红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心境是寂寞的。”“而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这是可以惋惜的,正像我们对于萧红的早死深致其惋惜一样。”^[8]

萧红写作《呼兰河传》虽自1940年始,距她的扶桑之旅已有三年之久,然而最初恋乡情怀的寂寞袭扰是自日本开始的。她在人生的道路上已经跋涉了29年,她一直幻想着能够建立起一个和谐美满的小家庭,但是这个最重感情的女人,却从来没有在感情上得到过满足,她感到社会对她无情而冷漠。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心情和身体状态下,她更加怀念自己的故乡和童

年。然而萧红在她不幸的童年,没有得到过温暖人心的母爱,再加上她的聪颖和敏感,就形成了她比别的女性更加细腻、更加多愁善感的性格。于是她在青年时代告别了埋葬着她祖父的故乡,跑到社会的汪洋大海里去追求,无非是希望找到一种没有冷漠、只有爱怜,没有邪恶、只有善良,没有压迫、只要平等,没有愚昧、只要文明的理想生活境界。但是,当她在人生的道路上疲惫得跋涉了29年之后,黑暗的旧中国仍然是一片混乱污浊。不幸的童年留在她内心深处的伤痕,常常像一个隐藏在心中的魔鬼,时时咬噬着她那颗多愁善感的灵魂。她对社会与人生的不满,更加强烈地使她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言状的孤独与寂寞。这种属于萧红这类渴求爱怜的、多愁善感的女性的细腻的心理,恐怕是任何男性都难以透彻地理解的,即使是那些真诚地关怀她、爱护她的人,也不能猜测出她内心的苦衷。

就是带着这种十分苦闷与惆怅的情绪,这种刻骨铭心的怀念,在远离故乡的异地,难以宣泄和倾诉,她借助手中的笔,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这时的她已近中年,在千里之外的香港,十分怀念自己的童年和故乡。她回忆起慈祥的老祖父那一双笑盈盈的眼睛,和他那老迈的、温柔的话语;回忆起那曾经一度是属于她和老祖父两个人的美丽的后园;回忆起自己的娇憨和老祖父的疼爱。写到这里,她的心里也许会感到暂时的温暖。然而紧接着,她会立刻同时回忆起父亲的凶相,继母的冷漠和老祖母的古怪寡情,因而心里就会感到十分的凄凉与酸楚。她更会回忆起那个闭塞而又荒僻的小村庄,那里住着愚昧而麻木的人们,他们除了过着卑琐平凡的现实生活之外,只会把跳大神、放河灯、四月十八娘娘庙会之类的封建迷信活动当成精神生活的内容。他们并不努力去改善自己的生活与改变自己的命运,带着盲目保守的劣根性。这些,都是童年留给她的记忆。

《呼兰河传》这部长篇小说既没有一以贯之的情节,也没有“主角”。她的小说似乎从来没预备向世人讲述什么故事,而始终沉静地抒发她的人生忧郁。她写人、叙事,与其说写人和事本身,毋宁说是在思忖体味这些人和事所蕴含的人生的滋味与意义。所以她笔下的人物、事件和风俗,都不复是现实中客观存在过的对象本身,而是基于她个人的情感、关怀而获得的人生印象。这些印象强烈地唤起她心灵的良知、温情与渴望,也长久地牵动她对生活的挚爱与忧伤。这些人生印象,是她的经验,她的记忆,也是她的情感。她向我们叙述她童年的故事的同时,更像是在倾诉,倾诉她的忧伤,她的悲哀和她的孤独。

从《呼兰河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在历尽世途坎坷之后对童年生活的皈依,饱尝四海漂泊之后对故乡风物的思恋。鲁迅说过,“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萧红在生命的最

后时光里,精神思虑难以割舍地牵系着已逝的光阴、遥远的故土,说明她的心灵中有一种难以拂去的寂寞之感,并在寂寞中忧郁地参悟着人间的生老病死、前尘后影,以直觉逼近“哲学”。她借作品宣泄胸间哀戚,也在这类作品中达到了艺术上新的高峰。

所以,《呼兰河传》更多地向读者传达的,是一种寂寞的心境,一种荒凉的感受,一种生命的无奈。她不会真实地向读者抱怨她的家庭的冷漠和家人的自私。她笔下的童年是她寂寞心境下的一个梦。她只是将这种寂寞的抒写方式赋予了笔下的人物形象。所以,我们不能过分认真地以《呼兰河传》中的人物来看现实中的人物,也不能以现实中的人物去比附作品中的人物。

三、萧红作品与传记的关系

萧红作为一个主观性较强的作家,其自传性的个人叙述与同一母题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别,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抹杀掉的。一件艺术品和现实的关系,与一本回忆录、一本日记或一封书信与现实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在另一个平面上形成的统一体。如果传记式文学研究法被误用,去解释并编排作家的作品,那么这种解释和编排往往可能与从作品本身的判断和分析所获得的结论是完全脱离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比如,在《呼兰河传》的研究中,出现的陈桂良和王科对于“寂寞”论的激烈争论就是这个问题的反映。^[9]

即使文学艺术作品可能具有某些因素确实同传记资料一致,这些因素也都经过重新整理而化入作品之中,已失去原来特殊的个人意义,仅仅成为具体的人生素材,成为作品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尽管《呼兰河传》和作家的生平之间有密切关系,但绝不意味着作品仅仅是作家生活的摹本。传记式的文学研究法忘记了,一部文学作品不只是经验的表现,而且总是一系列这类作品中最新的一部;无论是一出戏剧,一部小说,或者是一首诗,其决定因素不是别的,而是文学传统和惯例。传记式的文学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文学创作过程的正确理解,因为它打破了文学传记的连贯性而代之以隔离的、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传记式的研究方法也有无视很简单的心理学方面的事实倾向。与其说,文学作品体现一个作家的实际生活,不如说它体现作家的“梦”;或者说,艺术作品可以算是隐藏着作家真实面目的“面具”或“反自我”;还可以说,它是一幅生活的图画,而画中的生活正是作家所要逃避开的。

《呼兰河传》也不是供写萧红传记用的文献。作品中作家的个性只有在比喻的意味下才是存在的。这种气质只取决于作品本身,而不能凭纯粹的传记资料来确定。

(下转第33页)

时,对他们进行弥补性的策略训练,可以弥补传统教法的局限与不足,提高教学成效,同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更加自主的学习态度和独立的学习能力。本研究同时证实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不同层次的学习者的学习水平、学习风格、学习困难、已有学习策略等因素,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从而达到既尊重学生差异又促进学生共同发展和全面发展。本研究关注学习者的情感状态,关注学习技巧的真正提升,为教师创造性地解决共性与个性、统一性和灵活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广阔的空间,同时为进一步探讨听力学习策略训练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and 材料。

参考文献:

[1] Ellis, C. M. Tolerance of ambiguity and the teaching of ESL. A. In J. M. Re (ed.). *Learning Styles in the ESL/EFL Classroom*. C. Books 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2] Frenke, Brunsw k E. Intolerance of ambiguity as an emotional and perceptual personality variable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49(18).

[3] O'Malley, J & Chamot, A. *Learning Strateg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4] 黄盛. 听力学习策略的分类及训练方法 [J]. *基础英语教育*, 2008(4).

[5] 罗金. 歧义容忍度与中国大学生英语学习成绩的相关性分析 [J]. *理工高教研究*, 2008(4).

[6] 苏远连. 论听力学习策略的可教性——一项基于中国外语初学者的实验研究 [J]. *现代外语*, 2003(1).

[7] 吴勇毅, 陈钰. 善听者与不善听者听力学习策略对比研究 [J]. *汉语学习*, 2006(4).

[8] 周英. 歧义容忍度对英语专业学生听力理解的影响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0(4).

责任编辑: 郑诗峰

A Study of Listening Strategies Training Based on Different Levels of Tolerance of Ambiguity

CHEN We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level of tolerance of ambiguity and the effect of tolerance of ambiguity on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strategies of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this paper carried out a training programme in listening learning strategies which was designed according to learners' different levels of tolerance of ambiguity.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training was an effective way of improving listening proficiency.

Key words tolerance of ambiguity; listening learning strategy; training in learning strategy

(上接第 18 页)

四、结语

萧红的作品和有关她的传记之间,存在着不少平行的,隐约相似的,曲折反映的关系。她的作品可以是一种面具,一种戏剧化的传统表现。而且,这往往是她本身的经验、本身的生活的传统的戏剧化的表现。但是尽管如此,任何传记上的材料都不可能改变和影响文学批评中对她作品的评价。如果以忠实于作家的传记,并以外界资料所证实的作家的经验或感情与作品之间的相应性来评判文学,那么“真挚性”的准则就是完全错误的。“真挚性”与艺术价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所以我们在分析萧红的作品的过程中,固然不能完全忽视作家本人的因素,但是更应该立足于文学文本自身,更加注重分析其作品的文学性。毕竟,萧红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自身的一种梦的反映。

参考文献:

[1][8] 茅盾. 呼兰河传·序 [A]. 萧江. 呼兰河传 [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9. 9. 13~ 14.

[2][3] 骆宾基. 萧红小传 [M]. 上海: 建文书店, 民国三十六年 (1947 年): 4, 8.

[4] 葛浩文. 萧红评传 [M].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5. 14.

[5] 肖凤. 悲情女作家萧红 [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 219.

[6][7] 李重华. 呼兰学人说萧红 [M]. 哈尔滨出版社, 1991. 171, 177.

[9] 王科. “寂寞”论: 不该再继续的“经典”误读 [J]. *文学评论*, 2004(4); 陈桂良. “寂寞”论果真是对萧红作品的“经典误读”? [J]. *文艺争鸣·评论*, 2005(3); 王科. “寂寞”论, 真的是对 <呼兰河传> 的“经典误读” [J]. *文艺争鸣·评论*, 2005 (6).

责任编辑: 彭雷生